

用選票向「粗暴議政」說不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粗暴議政」的風氣變本加厲，抗爭的手法，更不斷升級，由肢體衝撞擴大到「借人頭」提出司法覆核，司法也被拖進政治紛爭的泥淖。這股逆流若不能及早剷止，司法覆核被濫用，特區的有效管治、社會的團結凝聚，以及香港的前途，都將休矣！隨着多個選舉活動即將開展，「沉默大多數」應用手上選票向粗暴議政、向濫用司法程序的行為「說不」，促使各大陣營重新認識港人的理性訴求。

近期，香港的政治風向球，由「佔領袖」轉為開列未來領袖的條件，進而再談公務員素質。畢竟，導致政府和立法會民意「雙衰」，行政立法彼此打格齟齬，互相拖累，固然是當中的主因；但「沉默大多數」未能積極作為，令整體社會缺乏制衡力量，間接縱容偏激思緒，也是有待正視的深層癥結。

施政屢遭折騰全民皆輸

香港實施行政主導體制，但行政長期偏處弱勢，行政立法關係在底谷反覆徘徊，反對派議員更由「忠實的反對派」演化為「兇猛的攔路虎」。政府的多項重要施政，無論是政治性的替補機制，還是民生性的擴建垃圾堆填區，以至屬於體育盛事的申辦亞運，幾經折騰，始終未能走出立法會的大門，即使是全民受惠的「派糖」，也是噓聲掩蓋掌聲。

本來，隨着威權年代結束，市民對從政者有質疑批評，理所當然。但是，這一屆立法會，「粗暴議政」的風氣變本加厲，對政策的攻訐抵制、對官員的人身攻擊，幾已成為「指定動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內搗亂，被逐離場。

作」；至於抗爭的手法，更見不斷升級，由肢體衝撞擴大到「借人頭」提出司法覆核，司法也被拖進政治紛爭的泥淖。這股逆流若不能及早剷止，司法覆核一旦濫用，恐會出現行政立法司法混雜的局面，特區的有效管治、社會的團結凝聚，以及香港的前途，都將休矣！

須指出，這一切的政治博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求取悅部分激進市民，勢要將政策推倒重來，令政府威信掃地。這是非常短視，亦是十分不公義的。事實上，透過頻頻不止的民望走向，市民經已發出一個明確信息，對這種「你強我弱」式的惡鬥深感不滿，政府和政黨都必須知所因應，避免陷進全民皆輸的境況。

「沉默大多數」要用選票制衡

其實，導致今天出現激進當道、行政立法各走偏鋒的情況，背後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因素，就是「沉默大多數」的啞忍，社會亦由此失去內部制衡。

1969年，美國深陷越戰泥沼，國內反戰運動又風起雲湧，面對內外交煎的局勢，總統尼克松發表了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數》演說，成功喚起「沉默大多數」的維護自身利益、社會平穩方面的關注，爭取主流美國民眾的認同，成功化解政治危機，為美國政府處理越戰問題，換取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隨着多個選舉活動即將開展，只要「沉默大多數」願意發聲，願意用選票向粗暴議政、向濫用司法覆核「說不」；將可迫使各大陣營重新認識港人的理性訴求，而目前死結困局，亦將可以迎刃而解。

「交通穩定基金」為民非為企業

張學明 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交通事務發言人

民建聯設計的「穩定基金」，並不是直接補貼公共交通企業的營運開支。我們的想法是當公共交通機構按現行票價調整機制下，獲准的加幅所帶來的額外收入，由基金部分或全額支付，以減輕加價對普羅市民的開支壓力。因此，「穩定基金」使用的前提是公共交通機構必須獲得批准調整價格，而不是當公共交通工具因某些經營成本上升就可以動用「穩定基金」補貼。

九巴母公司載通發出盈警，並建議政府成立「票價穩定基金」，以補貼營運成本，特別是油價的開銷，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不少論者更將九巴的提議與民建聯提及的「公共交通收費穩定基金」相提並論，抨擊建議補貼私人企業，幫它們封蝕本門。筆者有必要作出澄清，民建聯要協助的對象是廣大市民，而非企業本身。

「穩定基金」不補貼企業營運開支

首先，民建聯在去年提出設立「公共交通收費穩定基金」(下稱：「穩定基金」)是在美國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香港受制於聯匯制度下，社會普遍預期通脹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斷攀升。而在當時公共交通工具已接連加價，對普羅大眾影響已經開始浮現，尤其是居於偏遠地區或離島的市民，每日來回交通費動輒四、五十元，負擔的確很大，需要措施協助市民。

民建聯當時設計的「穩定基金」，並不是直接補貼公共交通企業的營運開支。我們的想法是當公共交通機構按現行票價調整機制下，獲准的加幅所帶來的額外收入，由基金部分或全額支付，以減輕加價對普羅市民的開支壓力。因此，「穩定基金」使用的前提是公共交通機構必須獲得批准調整價格，而不是當公共交通工具因某些經營成本上升就可以動用「穩定基金」補貼。

以九巴為例，早前獲行政會議按現有機制批准了平均4.5%的加價幅度。如果按民建聯的建議，此額外4.5%的票價加幅可由「穩定基金」部分或全額支付，市民要承受的加幅因此而減輕。對九巴而言，已批准的4.5%加幅所帶來的收入已可預期的，只是收入究竟是從市民口袋中拿出，還是由政府設立的「穩定基金」與市民共同分擔而已。

不容許九巴有准許利潤保證

再者，今次盈警事件也不會因有「穩定基金」而不會出現，原因是九巴評估了獲准的票價加幅後，認為不能抵銷公司的營運開支上升，令盈利受壓，甚至虧蝕才發出盈警，所以就算有民建聯建議的「穩定基金」，它也只不過是補助市民要承擔已獲准的票價加幅，不是補貼公司的營運開支。因此，盈警事件也正好說明民建聯的建議不會造成保證私人企業利潤的效果。

相反九巴提到的「票價穩定基金」卻有很大的保證利潤味道，因為此構思是直接補貼營運開支。雖然該公司負責人表示願意在「有盈利」時注資入「票價穩定基金」，但究竟他們想將什麼業務收益計算入所謂「有盈利」的範圍內？究竟他們又要賺幾多，才肯注資入「票價穩定基金」？這些關鍵問題是沒有回答的，更重要一旦有此注資安排下，是否變相容許九巴有准許利潤保證，大家則有必要深思。

是誰扼殺了中小企？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一名中五女學生透過記載白田購物商場的歷史點滴，寫出了一份報告，名為《生活的圍牆》，獲得了消委會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高級組冠軍。

報告中有個十分重要的詞：「倒模」。這名學生發現，一個商場彷彿就有着相同的組成元素，內裡的商舖根本就是來來去去那幾間連鎖店。她說：「地方太大，空間太少，商場太多，選擇太少。」希望政府於進行城市規劃之時，可以更用心去觀察社會；她希望街坊商場與大型購物商場可以並存，在社區中留一點生活味道。

筆者不清楚這位同學有否試圖為這個社會現象作出解釋，還是政府的城市規劃就是她心中的答案？也許有些讀者會認為是高租金環境造成了這個現象，但筆者相信也並不是最終答案。

獅子山學會的答案：「最低工資」

高租金的環境的確對中小企造成了困難。然而細心想想，大企業同樣地面對着同樣的問題嗎？高租金的環境並沒有針對中小企。

那麼最低工資又如何？最低工資同樣是一刀切！無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亦沒有特殊優惠，同樣是時薪28元。然而，人工的成本可以轉移，租金的成本卻不容易轉移。

經濟學上，生產的成本可以大致分為：土地(Land)、勞工(Labour)、資本(Capital)。資本可以解釋為所有節省

勞力的技術、設備。租金升了，不容易找其他東西去代替營商所需的空間；然而，勞工的成本上升了，勞工就容易被資本取替。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洗碗的工作將會被洗碗碟機取代，收銀的工作將會更大程度由機器取代，就像機場登機手續一樣，除了把行李寄艙之外，一概由電腦協助閣下完成。當最先進的F-35戰鬥機都可以被無人駕駛戰機與精確的導彈所取代的時候，不能被電腦取代的工作確是少之又少。

自動化如何損害中小企？試想一下，機械的投入本來就是巨大的投資，愈複雜、愈先進的系統往往就涉及更大的投資額，相比起大企業，中小企何來能力去負擔這個龐大的財政負擔？就算有能力，又是否值得去冒這個風險？須知購入機器之後，其價格勢必逐漸貶值，亦難保證二手市場的存在，不需要之時可以將其變賣。所以，當勞工成本上升之時，亦只有大企業可以有效而迅速地改變經營模式，以最低成本去經營。中小企卻只有走上被淘汰的道路。

當中小企的生存變得困難，大企業自然進佔本來由中小企佔有的市場。倒模的商場，是城市規劃所不能改變的事情；在可見的將來，倒模的情況只會更加嚴重。

把複雜的社會運作簡單化，希望以立法改變社會運作，往往就會產生這些難以估計的後果。數年過後，基層會否因為最低工資而活得更好？

中美關係藏眾多利益交匯點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二戰後，美國充當「世界警察」，全球的事務都成為其「份內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變成華盛頓政客的慣性思維，「想方設法遏制和顛覆中國」演變成一個荒唐策略。美利堅於是衍生出「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西藏歸屬未定」、「對台灣關係法」、「在中國周圍實施高頻率偵察」、「鼓動日本、韓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抵抗中國」等形形色色危害中國安全的論調和舉動。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甚至在國會山稱，武力征服中國不容易，應該致力中國下一代的「和平演變」。所有這些，迫使北京對華盛頓產生濃厚的戒心。

中國目前有外匯儲備3.2萬億美元，持有1萬多億美元美國國債，到2015年對美國貿易額將達到5000億美元，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巨額利潤；在美國超市，「中國製造」貨品比比皆是，也是美國民眾的最愛。希望「中國徹底崩潰」的政客不明白最簡單的道理，就是「崩潰」並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崩潰」對美國乃至世界沒有任何好處。其實，中美關係蘊藏著眾多共同利益，兩國應該共同努力尋找和發掘「交匯點」，造福兩國、造福人類、造福全世界。

白宮應該「推敲」北京思路

美國曾經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國現在卻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美中的一舉一動都牽動着全球的眼光。中國的龐大外匯儲備左右着世界金融市場，其流動方向是華盛頓、歐洲和世界市場高度關注的焦點。美國和歐盟兩大經濟體在遇到困難的時刻，最先想到的是中國，最希望得到的是北京的支持。儘管中美文化差異經常導致兩國外交等方面摩擦，但更重大國際問題，如核不擴散、全球變暖等議題都需要美中兩國的合作。事實證明，單邊策略不僅行不通，而且可能越來越糟。擴大

互信，避免對抗和衝突，對美國最有利。

近30年來，中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使中國外匯儲備不斷膨脹，中國對美元資產的需求持續強勁，客觀上減輕了世界各國央行對美元資產所產生出來的巨大貶值壓力和消極影響。美國最擔心「如果北京減持美元資產可能帶給美國的經濟災難」，但對北京的經濟思路卻是一知半解。中國之所以持有大量美元儲備，是相信華盛頓和美元仍然值得持有和信任。如果北京改儲其它貨幣，可能引發美國國家信用度下降，給外匯市場帶來災難性後果，這乃是中國最不願意看到的慘象。

神州發展需要美國元素

中美關係之所以能夠排除各種障礙而維持相對穩定，關鍵一點是美國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在對華政策上的一致性，確保了總統換屆後華盛頓對華政策的連續性。上世紀70年代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福特推動開啟的中美關係，最後由民主黨總統卡特在其任內實現了美中建交，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美國創新型科技仍然保持着世界領先的地位，不斷更新的理念和創造力維繫的科研中心，是中國學習和借鑒的榜樣。中國發展需要更多美國元素。美國的大學對中國年輕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魅力，就是因為在那裡可以學到東西。

儘管美國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美式民主」也有其致命的弱點——白宮的周期性錯誤思維，屢屢發動戰爭而導致其出現經濟危機、債台高築、國力下滑；但美洲大陸人民和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精英，經過230多年的努力，對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探索和實踐，仍然值得希望邁向現代化的中國給以重視、敬重和借鑒。全面實現現代化是中國政府和民眾的長期夢想，也是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認真研究美國的發展和興衰歷史，吸取其中的精華，避免他們已經嘗試過的教訓，有助中國走向更加繁榮的明天。

西方干預香港事務進入新活躍期

思成

近年來，香港作為美國海外利益最密集地區的角色正日益強化，而香港政治生態也表明，其越來越成為美國所說的「中國唯一能挑戰共產黨政府的角落」。西方勢力一面插手香港事務，一面利用香港影響，演變中國，在「不撕破臉」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使香港符合並服務於其整體對華戰略意圖和戰略佈局。有評論認為，香港的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博奕實質是中美之間的博奕。搞亂香港，可讓中國背上更大的包袱；香港平穩，中國的實力則將如虎添翼。只要中美還存有結構性矛盾，香港必然被推在西方干預和中國反西方干預的風口浪尖上。

美國將進一步強化香港在美國對華戰略，乃至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對香港事務的干涉力度未來也會繼續增強。7月25日，國務卿克林頓·希拉里訪問香港。希拉里是1999年以來美國訪港的最高級別官員。希拉里此訪會見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與部分立法會議員見面，並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議題發表演講，頗有將香港視為其重返亞洲、制約中國的一個戰略支點の意味。無論北京或華盛頓，都會把香港放在國家安全利益、國際政治天秤和全球戰略的高度去看。現在美國看重香港這一着力點，未來是否以此為平台圍繞中美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及金融議題與中國搞「戰略對沖」，尚有待進一步觀察。

借香港推動中國的「茉莉花革命」

其次，美國受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的鼓舞與啟發，強化了香港在對華演變戰略佈局中的功能。過去美國認為，與中國政府合作最終會「幫助」中國按西方模式向政治上更開放、更民主化的方向發展，但結果與預期相差甚遠，中國遲遲不變，相反倒是變出個令西方驚異的更大的「中國模式」或是「中國道路」。基於此，美國在對華關係中越來越呈現出紧迫感。

然而，今年北非、西亞局勢持續動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下手機會。5月9日第三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上，美國副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希拉里高調「向中國當局表達了對中國人權記錄以及中國正在進行鎮壓行動的憂慮」，要求中國在自由、人權議題上「實現對國際社會所做的承諾」。5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全面支持中東民主化改革的政策演講。同日，美駐港總領事楊魁棟在香港美國商會演講時稱對中國「人權狀況」出現「惡化」表示關注並「深感憂慮」。

與之相呼應，「茉莉花革命」爆發以來，國際上煽動「中國茉莉花革命」的角色也開始浮出水面：「非暴力抵抗運動教父」夏普、網絡時代「非暴力革命推手」艾克曼、「無國界記者」秘書長朱利亞爾、「大赦國際」秘書長謝提、「中國茉莉花革命」推手白樂崎等，或提供理論指引，或指導炒作敏感議題，或鼓動內外聯動，或煽動國際輿論向中國施壓，或利用中國內部敏感事件和時間點挑動內亂，企圖讓「茉莉花

在中國「落地生根」。而企圖推動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的最佳支點之一，就是香港。

2月20日以來，敵對勢力利用香港推動內地「茉莉花革命」的動作不斷，視之為繼「六四」和「劉曉波事件」後，又一個可以整合各類勢力反華的新議題、新平台。雖然一直不成氣候，但從中已可以看出，參與並利用香港推動「茉莉花革命」的勢力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香港的反對派政團、激進勢力和右翼傳媒；第二類是逃至境外的「異見人士」包括「民運」分子、「法輪功」分子及少數分離主義分子等；第三類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香港的分支機構、西方在香港的傳媒機構和西方駐港領事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大赦國際」香港分會和自由亞洲電台等暗地裡為香港反對派撐腰站台；美領事館更直接向組織者吹風、向右翼傳媒致電打氣，並要求其配合美方表態；各類勢力還通過研討座談等方式，交流和總結活動的經驗教訓，商討下步對策。西方在港傳媒機構則通過輿論炒作，乘機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為「茉莉花革命」叫好。

第三，繼續將香港視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橋頭堡」。隨着香港與內地的聯繫越發緊密，香港已成為影響內地最直接的、最便捷的渠道。香港的右翼傳媒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茉莉花』就是榜樣。如果香港能開出『紫荊花』，縱使不能讓『茉莉花』在內地生根發芽，也能讓『紫荊花』香飄內地」。一些媒體甚至揚言，香港是最後的「自由堡壘」，不惜一切也要堅守，這間接道出了激進反對政團和幕後勢力明知關不成立選要鬧下去的深層原因。

看重港組織「六四」活動對內地影響

第四，特別看重香港組織「六四」活動及對內地的影響。英駐港總領事安竹於5月3日發表文章稱，雖然香港擁有活力的傳媒，但最近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正在增加。香港要珍惜和保護已有的新聞自由，保障傳媒可提供一個市民討論社會議題、挑戰政府的開放空間。美駐港總領事楊魁棟於5月20日演講時揚言，只要艾未未等仍未獲釋，美就一定會保持沉默。美國副國務卿斯丹伯格、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布朗均選在敏感時機於6月1日至3日分別訪問香港，並點評香港舉行的「六四」活動。斯丹伯格稱，美在港有其經濟及文化獨特聯繫，美樂見港人至今仍未公開表達對「六四」的意見。布朗稱，港人每年舉辦悼念「六四」的行動，是香港仍有表達自由的重要證明。西方主要媒體在第一時間報道香港「六四」活動，一致強調香港在中國民主改革中所發揮的作用。

插手香港事務 促華「和平演變」

第五，西方更加重視香港在遏制中國作用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在香港搞事收穫了一定「成果」。美國對華「和平演變」戰略長期將重點放在民運分子、持不同政見者身上，包括提供大批資金，但效果不佳，而且搞不到中國內部。但重點點在香港則不同，既可以搞到內地，而且事實證明成效似乎比較明顯，香港的政治生態一直未有根本改觀，英美在其中可謂「居功甚大」。今年以來美英動作明顯增多或許表明在這方面佈局已經有了新的安排。

中美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導致了雙方的戰略猜疑，這種猜疑又自然地落到了香港的頭上。在西方眼中，中國內地建立民主主要比香港難得多，香港的民主程度提高，假以時日將會支持中國內地的和平發展，香港可以幫助中國內地和區域和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建立21世紀和平發展所需要的機制；「香港、民主、中國內地、和平演變」是一個整體中的具體部分，通過香港以點帶面，自然就會形成相應的邏輯聯繫，就可以通過插手香港事務進而確立一種影響、牽制、改變中國的新模式。因此，遏制及推動中國崛起的兩大力量，必然會在香港交鋒。(本文轉載自8月號《家刊》，內容有刪減。)